

墨子民生思想新探

孙 慧 明

(河南工程学院 社科系,河南郑州 451191)

摘 要: 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墨子,心系天下民生之安危,把“兴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”作为自己及整个墨家学派的思想主旨。为兴天下人之利,墨子在经济民生上,主张强本节用;政治民生上,提倡尚贤使能;文化民生上,强调先质后文。墨子的民生思想对我国在经济上确立合理的消费模式、政治上推行公务员制度、文化上推进文化的大发展、大繁荣均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
关键词: 墨子; 民生思想; 解读; 借鉴

中图分类号: B224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5-7110 (2011)06-0033-04

先秦时期,儒墨并称显学。秦汉以降,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,墨子学说曾长期被尘封。至明清时期,由于人们的商品意识渐浓,刻书业随之大兴。学者们开始对《墨子》进行校注、考据与刊刻。至于对墨家学说的义理研究,则始于清末的梁启超先生。随后,关于墨家学说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,学者们对墨家学说义理的阐发可谓是见仁见智,但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极少联系社会现实。当代,学者们多研究墨家兼爱学说,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资源;研究墨家节用思想,为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服务。至于,墨子的民生思想,较少有人涉猎。本文试图从经济民生、政治民生、文化民生三个维度分析墨子的民生思想,以探寻墨子民生思想的当代价值。

一、经济民生: 强本节用

史学家司马谈在《论六家要旨》中对墨家经济民生思想评论道:“……夫世异时移,事业不必同,故曰‘俭而难尊’。要曰强本节用,则人给家足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长,虽百家弗能废也。”司马谈认为,墨家师徒的克勤克俭的生活方式令人难以遵循,但墨子强本节用的主张对民生则大有裨益,能给人以家足。墨子强本节用包含着两个相

辅相成的观点:一是强本,即发展社会生产力,二是节用,即在发展经济、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,节约社会资源。生产是节用的前提条件,节用是为了更好地生产,其目的都是为了民生。

首先,“强本”,即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。墨子指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对“强本”的认识:王公大人知道“强必治,不强必乱;强必宁,不强必危;故不敢倦怠。”卿大夫知道“强必贵,不强必贱;强必荣,不强必辱;故不敢倦怠。”农夫知道“强必富,不强必贫;强必饱,不强必饥;故不敢倦怠。”(《墨子·非命下》,以下所引《墨子》只注篇名)墨子还指出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及其根本途径:一是,人类生存之必须。墨子认为,动物因有羽毛可充衣物,因有蹄爪可当鞋子,因有水草可以充饥。因此,它们不需要耕种稼穡,衣食之财已具备。而人类要么“竭股肱之力”,要么“殫其思虑之智”(《非命下》)。人类为了生存,不能懒散,必须勤奋劳动,否则就会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和灭种的威胁。二是,是解决民生问题之根本。墨子认为“民有三患:饥者不得食,寒者不得衣,劳者不得息。三者,民之巨患也。”(《非命下》)饥寒的原因是劳动的人数太少了,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和衣服。要使人人有饭吃、有衣穿,必须充分

收稿日期: 2011-11-12

基金项目: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(2011FZX005)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: 孙慧明(1964-),女,河南郸城人,河南工程学院社科系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。

重视社会生产劳动。三是,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。这是墨子经济民生中最重要的观点。他明确提出“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”(《节用中》)、“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”(《辞过》)。凡生产一种东西,要考虑到投入与产出之比。对于那些费财劳力的事情,即投入成本较多的生产活动,而经济效益较差,尤其是不利于民生的事情就不要去做,这样用财不靡费,人民也不劳苦,而增加的利益却是很多。“节葬”和“非乐”二主张,就是在这个准则下演绎出来的。这种注重经济效益,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,在资源日益匮乏和环境日益恶化的现代社会,具有更大的借鉴价值。

社会生产既然是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的根本所在,因此,墨子主张人人必须参加劳动,反对不劳而获。“赖其力者生,不赖其力者不生”(《非乐上》)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表述。它包含了两层意思:一方面,每个人必须依靠劳动创造财富,才能生存;反之不依靠劳动创造财富就不能生存;另一方面,在分配制度上,只有依靠劳动的人才能分到社会财富。对于那些“不与其劳,获其实,非其所有而取之”的行为,应该是“上得且罚之,众闻则非之。”(《天志下》)杨俊光先生评价说:“对物质生产的重视,为前此所无,唯后之法家可与伦比。于此亦可见,法家的生产论实源于墨子。”^[1](P119)]

其次,节用。强本节用或开源节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墨子说:“其力时急,而自养剑”,“其生财密,其用之节”(《七患》),深刻地指出了积极生产与消极节约的不可分割性。如果社会各阶层都能够去奢崇俭、增加生产,那么万民就能同获其利、同过安宁无忧的生活。节用的总原则是:“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。”(《节用中》)墨子要求生产不要过剩,不要过多消耗自然资源,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节约的好处表现为:“圣王为政一国,一国可倍也;大之为政天下,天下可倍也。其倍之,非外取地也,因其国家去无用之费,足以倍之。”(《节用上》)因此,墨子要求君主效法古代圣王,发扬节约精神:“圣王为政,其发令兴事,使民用财也,无不加用而为者,是故用财不费,民德不劳,其兴利多矣。”(《节用上》)

在经济方面,荀子和墨子都主张强本节用,但目的却极为不同。墨子主张节用的目的是为了民生。因此,他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要节约,而且墨家师徒都身体力行,做到量体而衣,果腹而食。荀子认为“强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。”(《荀子·天论》),

但他只要求普通民众节俭,而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威仪可以摆阔绰,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礼制。因此,同样主张强本节用,但荀子却批评墨子的节俭是“上功用,大俭约,而慢差等,曾不足以容辨异,悬君臣。”(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)荀子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,更关心的是如何维持社会的治乱而不是民生之艰难。因此,他把墨子忧国忧民的情怀斥之为:“墨子之言,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。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,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。”(《荀子·富国》)如果墨子是为了个人私虑谋划,何以弄到“日夜不休,以自苦为极”的地步(《庄子·天下》)。由此可见,荀子的批评有失公允,说明荀、墨二人的社会立场不同。

二、政治民生:尚贤使能

从社会底层走出的墨子,对民生的三大巨患“饥者不得食,寒者不得衣,劳者不得息”(《辞过》)的状况充满同情。他不仅从经济角度考虑如何解决民生问题,亦从政治方面谋划其解决方案。因此,墨子把民生与政治联系起来,视国家和老百姓的贫穷为治国的第一要务。他指出国家“贫且乱”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不能尚贤使能,而要治理好国家和改善民生,根本途径就是政治上推行尚贤使能的策略,并为此勾画了尚贤使能的图景,蕴含着尚贤使能的条件、目的及所达到的社会效果。

其一,尚贤使能的前提条件。为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民生环境,墨子认为,贯彻尚贤使能的方针,要做到如下几点:一是,各级官吏包括天子在内由人民选举产生。他认为天子民选,则天子不贵;三公民选,则三公不贵;诸侯之“正长”民选,则诸侯之“正长”不贵。按照墨子的设想,天子、三公、诸侯之“正长”与平民同,只有社会职务的不同,而无贵贱之分,这便在实际取消了旧有的礼制等级。二是,被选举人不论出身地位,有能则举之。墨子认为,出身于农与工肆的人,也能够做官,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,要求人人在政治上平等。为了能够真正起用贤人,墨子提出要“不党父兄,不偏富贵,不嬖颜色。”(《尚贤中》)其意为,不要因为父兄而结党,不要因为其富贵而偏重,不要因为其有姿色而宠爱。这三点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。“不党父兄”就是回避制度,用人时要尽量不用自己的亲朋好友;“不偏富贵”就是不要见钱眼开,巴结有钱人,不要考虑私人的得利,这就要拒绝腐蚀。“不嬖颜色”就是要求用人时不要看见人长得漂亮,就马上任用。三是,对官吏实行监督机制。应按照他们的业绩确定奖赏,

根据功勋发给俸禄。有才能的就提拔他们,无能的就撤消他们。如此以来,就实现了“官无常贵,而民无终贱”的政治局面(《尚贤上》)。

墨子的贤人政治理论,不同于儒家的“尊贤有等”。“儒家尚贤,是为士请命,要求从下层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;墨家比儒家走得更远,为民请命,要求从庶民之中选拔人才。儒家找到了从士中选拔人才的方法,那就是文化考试,考察掌握礼仪文化知识的程度,后来演变成科举考试,得到了落实。墨家没有找到从庶民之中选拔人才的方法,无法得到落实,只能停留在说法上,没有落实到做法上”^[2]。但墨子尚贤使能的政治思想具有很大的先进性,喊出了人民要求平等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心声。只不过在普通民众与统治者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前提下,设想政治平等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。

其二,尚贤使能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害。墨子指出,古代“建国设都,立正长也,非高其爵、厚其禄、富贵佚而错之也,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、富贫众寡、安危治乱也。故古者圣王为政若此。”既然国家设立官吏的目的是为了民众的利益,那么当国家处于困难时期,民生困苦,各级官吏包括君主在内都应该与民共患难。他们的俸禄都应该相应的减少:“岁馔,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;旱,则损禄五分之二;凶,则损禄五分之三;饥,则损禄五分之四;饿,则尽无禄,禀食而已矣。故凶饥存乎国,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。”(《七患》)墨子提倡减少官吏俸禄,不仅仅是要求官民同甘苦、共患难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认为“凡五谷者,民之所仰也,君之所以为养也。故民无仰,则君无养”(《七患》)。在这里,墨子表达了一个正确的观念:人民养活了君主和官吏,而不是君主和官吏养活了人民。墨子关于官民关系的思想,对于我国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。有些官吏做官的目的,不是为人民服务,而是为了以权谋私。这种官僚主义的行为和作风不仅严重地破坏了官民关系,败坏了社会风气。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,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
其三,尚贤使能的效果是利于民生。贤人所具有的品质是“厚乎德行,辨乎言谈,博乎道术”,因而他们是“国家之珍,而社稷之左也。”(《尚贤上》)如果他们能够参与到社会的各级政府,就会受到这样的效果:“国家治而刑法正,官府实则万民富。”(《尚贤中》)贤人执政的效果还不止于此,最重要的是:“墨子设想,根据所染原则,人们看到

贫贱者被任用后,受利益的驱使,会产生连锁反应—富者和近权者不再居高自恃,贫贱和远权者不再自暴自弃,大家都争先恐后、自强勤勉,从而收到赏善罚恶、劝善教化的效果。”^[3]尚贤为政,能成就安和乐利、互助合作的社会:有力量的用他的力量帮助别人;有货财的将他的货财分给别人;有学问的将他的学问交给别人,各人乐于以自己的能力贡献社会、造福人群。有了这样的社会,人类才能永远存续,天下才能永远太平。由此可见“尚贤者,天鬼百姓利之,而政事之本也”。(《尚贤下》)

三、文化民生:先质后文

长期以来,人们对墨子的文化观,特别是“非乐”思想多有诟病,认为这是一种只重视物质生活而忽视精神生活的短视。荀子曾批评墨子,是“蔽于用而不知文”(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)。墨子确实是站在下层民众的角度,崇尚实利,认为统治者为了豢养乐人和制造乐器不仅靡费大量社会钱财,而且音乐会贻误社会成员各任其事,所以主张“非乐”。但墨子并非只知实用,而不懂得精神生活的享受,而是主张先质后文,亦即解决了人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后,再从事音乐等精神活动。

首先,墨子主张为乐的前提条件是国泰民安。墨子之时,曾有人对其“非乐”的观点,特别是“圣王不作乐”的说法提出质疑。据《墨子·三辩》载:有一个叫程繁的人对墨子说:“从前诸侯工作累了,听钟鼓的音乐来休养精神,士大夫工作累了,奏琴瑟的音乐来休息;农夫春天耕种,夏天割草,秋天收获,冬天储藏,闲时也击瓦盆土器为乐。现在夫子说:‘圣王不作乐。’这就譬如使马永远驾车,而不卸去车子;将弓永远张开,而不肯放松一样。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够做得到的!”墨子回答道:“从前尧舜时,只有茅草盖的屋子,礼乐之制不过如此。等到汤放桀于大海,死于南巢后,统一天下,自立为王,事成功立,没有大的后患了,于是就着先王传下来的音乐,自己又作新的音乐,命名为‘护’,又修‘九招’之乐;周武王既灭殷,将纣杀死,统一天下,自立为王,事成功立,没有大的后患了,于是就着先王传下来的音乐,自己又作新的音乐,命名为‘象’;成王即位后就着先王传下来的音乐,自己又作新的音乐,命名为‘驺虞’”。墨子回答程繁时,并没有否认圣王作乐,相反承认了此事,似乎是自相矛盾。对此程繁更为不解地说:“夫子说:‘圣王不作乐’难道这个不是音乐吗?‘护’等就是音乐,怎么说圣王没有音乐呢?”墨子

进一步回答说：“圣王设制，对于事物，凡是不愿它们太多的，必定要限制它们。圣王虽有音乐，但是极少，根本不妨碍正事，这也如同没有音乐一样。”墨子在回答程繁的质疑时，反复使用的一句话是“事成功立，没有大的后患了”，指出了为乐的前提是国泰民安，而且从事音乐不要贻误大事。可见墨子“非乐”，是反对过分耽于乐而误了正事，而不是全然反对音乐。

其次，墨子主张“先质后文”，即人民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，再考虑精神享受。墨子指出：“食必常饱，然后求美；衣必常暖，然后求丽；居必常安，然后求乐。可为长，行可久，先质后文。此圣人之务。”（《说苑·反质》）他认为每个人都知道美好的事物能给人带来好处，但凡事要有先后、轻重缓急，“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，非以大钟、鸣鼓、琴瑟、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，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，非以牲豢、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，非以高台、厚榭、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。虽身知其安也，口知其甘也，目知其美也，耳知其乐也。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，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”（《非乐上》）墨子认为，作为一个仁者，应该为天下万民的利益着想，以增进天下人的福利为前提，绝不会为满足自己的耳、目、口、体的欲望而行事。更何况为追求这些欲望，而暴夺人民衣食之财的行为，仁者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墨子也不是不要人们享受精神生活，过一种全然无味的日子，而是认为在饥饿、寒冷等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满足之后才能谈得上精神享受。可

见，“先质”而“后文”是墨子文化思想的本旨，而不是重“质”而废“文”。他认为万民能够“常饱”、“常暖”、“常安”之后，才谈得上“求美”、“求丽”、“求乐”。若万民不能“常饱”、“常暖”、“常安”，则少数人享受“美”、“丽”、“乐”，对天下万民是不利的。因此，墨子反对这种为了少数人的奢华生活，而牺牲大多人的行为，体现出思想家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。民生问题是百姓最关心、最直接的利益问题。因此，应该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民生，并以此作为施政的标准。

民生问题处理得好，就能极大地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，增强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否，都与民生有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有关。可见，民生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、社会问题，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。墨子的民生思想对我国经济上确立合理的消费模式，政治上推行公务员制度，文化上努力建设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杨俊光.墨子新论[M].苏州：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5.
- [2] 宋志明.墨子天学新探[J].中国哲学史，2009，（4）.
- [3] 魏义霞.论墨子“以尚贤使能为政”的政治哲学[J].齐鲁学刊，2010，（1）.

责任编辑：郭泮溪

A Tentative Exploration of Mencius' Thoughts on People's Livelihood

SUN Hui-ming

(Dept of Social Sciences,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, Zhengzhou 451191, China)

Abstract: Born in a lower-class family, Mencius focused his attention on people's livelihood, and advocated “bringing benefits to the country and ridding people of their disasters.” Economically, he advocated enhancing agriculture and cutting expenses; politically, he called for the use of people of talent and abilities; and culturally, he stressed the beauty of the essence instead of the surface. His ideas can serve for reference in establishing a rational mode of consumption, implementing a system of civil servants, and promoting the grea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ulture.

Key words: Mencius; thoughts on people's livelihood; interpretation